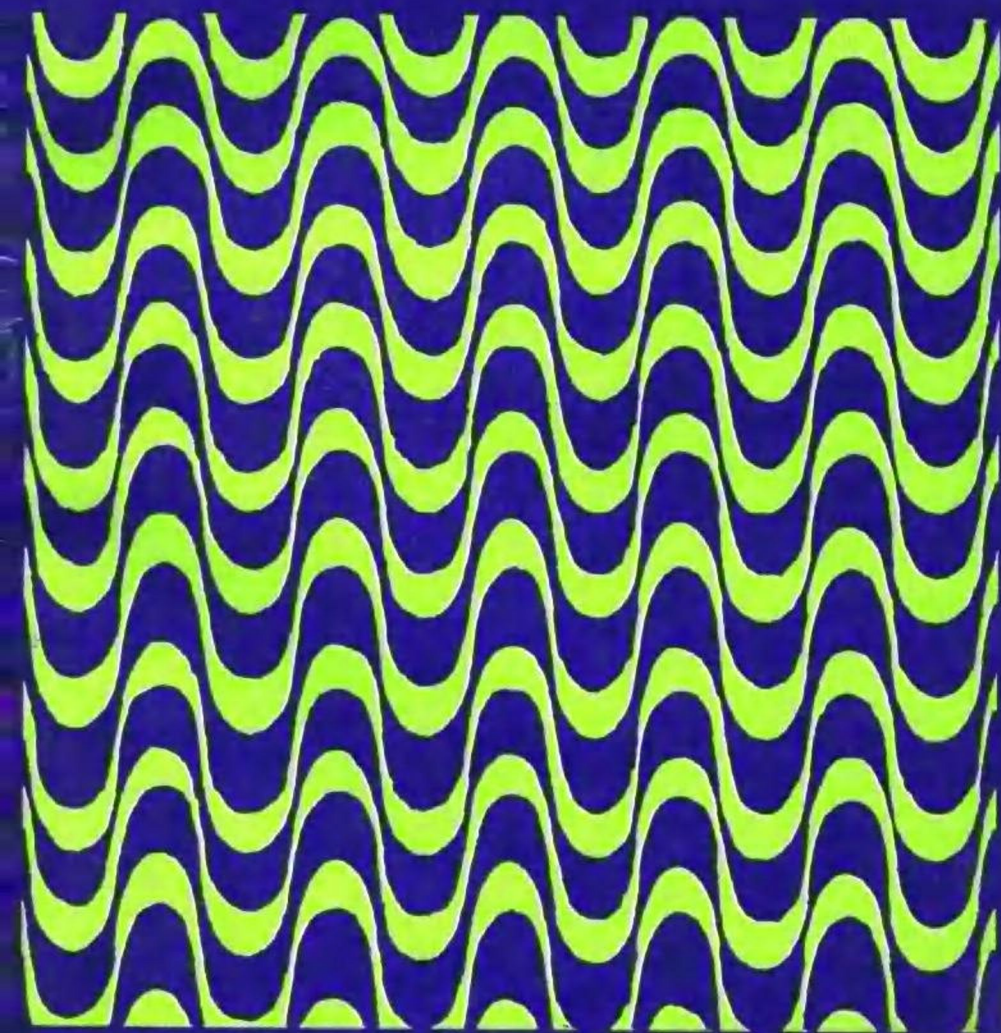


后凯恩斯主义

刘涤源 王平洲 编著

6



7-210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

晏智杰 著

人行研究生部藏书
分类号 F091.33/1
总 号 068531



068531

北京大学出版社

962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晏智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ISBN 7-301-02798-2

I. 亚… II. 晏… III.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西方国家-近代 IV. F091.33

书 名: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

著作责任者: 晏智杰

责任编辑: 符 丹 陈 义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798-2/F·225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75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752032

排 印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6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50 元

序

晏智杰同志从事经济学说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已多年。最近，在这教研工作的基础上，他写了《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等各自独立又前后衔接的著作，将以出版社，分期出版；来求序。

这些著作的目标是较全面、较系统而有一定新意的教材兼专著。它们以重商主义为上限，以马歇尔为首的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为下限，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一部断代史。它们固然适用为高校“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材，但又具有专题著作的性质。

本书的特点在于打破现有经济学说史著作已形成的旧模式，在较全面、较系统的新模式下，对于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理论和人物，提出若干具有创见性的论述。

首先，是处理历史上主流派和主要人物与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的地位和关系的问题。旧模式详论各主流派和主要人物的经济思想而忽略对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思想的论述。因此，在旧模式中，出现的是一系列的挺拔的山峰，而缺乏联系诸峰的连绵起伏的群岭。本书力矫此弊，在论述中，一方面仍然侧重于对主流派和主要人物学说的论述，予以更大的篇幅。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次要学派和次要人物，无论其为主流派之支流或为其反面，只要其对主流派或主要人物的思想有某些补充、牵连甚至质疑之处，本书都尽量予以不同程度的注意，使得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山峦起伏、峰岭交错的整体画面。必须说，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本书的作者也许不是这种观点的唯一主张者。在最近两三年内，在国内还有少数的

经济学史家的著作文稿上也突出地出现了这一倾向,虽然迄今还未见有这类书稿的公开出版。

其次,是在旧模式中,强调以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学说史全书主线的处理问题。旧模式可能受到五十至六十年代通用于国内高校中的苏联教科书和专家讲稿的影响。这种主线的强调也许来自错误地以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史,从而经济学说史教材,无论是通史或是断代史,都只能以之为编写的范本。这一偏见又影响到对上述的流派和人物的取舍的问题。本书力图矫正这一偏见,在依然重视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的同时,着意于兼顾其它各方面经济思想发展的论述。

也许更重要的是,本书如何处理对各学派和人物的述、评,如何在这些述、评中,提出自己的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

五六十年代,经济学说史著作重评而忽述。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相反的极端,重述而忽于评。本书决然摈弃前者以简单化的、贴标签式的形式代替科学分析的“评”,也谴责后者,不问青红皂白一切拿来主义的“述”。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一方面认识到,其本质上所具有的辩护性,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其具有寻求经济规律的实证性。对于他们的学说的述评,必须既有确切的阐述,又有公正的评价。在这述与评的交叉中,作者对于有争议的,关于理论的评价,人物的臧否,提出了和前人不同的见解和判断。读者可以对这些见解和判断仍然提出不同的意见。学术的问题是允许讨论的。真理愈辩愈明。这也该是本书作者所祈求的。

陈岱孙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前 言

本书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的历史考察,旨在为研习经济学说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一本教材,也想为深入了解政治经济学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书。继本书之后,还将有作者论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和演变的其它教材和专著问世。

在作者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迄今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近代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两大阶段。近代经济学又可划分为前古典、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三个时期,本书所论述的是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有关本书撰述所遵循的一些方法论(包括分期)原则,也是作者在撰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其它著作时遵循的原则,将在绪论中加以概述。

本书汇总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对其中已经发表的部分在收进本书时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在撰写过程中,我注意吸收了国内外最新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还认真考虑了专家学者、大学生和研究生及其他读者对我以往已发表成果或讲课的反应。对我来说,他们的批评建议同他们的首肯鼓励至少同样可贵,在本书问世之际,我愿重申欢迎指正的初衷。

陈岱孙教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指导,除去应允我多处引用他的著作,审阅书稿并提出意见以外,还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是为本书以及论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其它几部后

续著作撰写的。我对此深致谢意。当然,全书文责仍应由作者自负。

本书出版荣获台湾开立工程公司总经理詹庚辛先生热情资助,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晏智杰

1995 年 2 月

于北大畅春园寓所

绪 论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专论或分论近代西方经济史的著作,而且大都遵循着某种存在已久的格局或模式。我的目的不是固守旧的格局或模式,在业已不短的此类书单上再加一部,而是在尽可能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所得出的新认识,重新加以论述。

近代西方经济史:对象和范围

从时间上说,所谓“近代”,既不包含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经济思想,也不包含通常所谓“当代经济学”;从内容上说,所谓“西方经济学”,既不包括近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书实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史为对象,以西欧重商主义为上限,以凯恩斯主义为下限,前后大约四个多世纪。

这期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难以尽数的经济文献与人物。我们的论述既不宽泛到无所不包的“经济思想”,也不局限于所谓“经济分析”,而是介于其间的“经济学说”。片断零碎的经济观点不在其内,而囊括在内的未必都称得上是“分析的或科学的”。^①

主流与支流,正宗与异端的分野和斗争,贯穿于近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主流和正宗是指一定时期已被确认的、有既定体系的、被认为代表着正统观点、具有权威地位的学说,而与之相悖者

^① 参看: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86, p. 3.

通常被视为异端,处于支流地位。^① 我们的论述当以主流为主,但也不忽略支流,而且力求如实揭示主流与支流的更替过程。

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无疑在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毕竟不是全部,甚至在许多人或场合也不表现为理论学说的着眼点和归宿点。经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倒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或基线。因此,实际的情形比旧模式所包括的内容往往更丰富、更生动。本书力图全面地反映这个发展过程。

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我们遵循这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我们论述的对象时,应对这条原理作怎样的理解,对我们提出怎样的要求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后者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些经济学说是否具有科学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科学性,终究要看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性和客观要求,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怎样的作用。实践标准首先和最终地应被归结为生产力标准。

阶级分析必须坚持。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应当始终同实践标准相统一并服从于生产力标准,不这样理解,就可能背离实践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陷入教条式的宗派偏见。应当看到,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历史过程,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也都经历过或者正经历着一定的变化,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生产的观点,才有可能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对它们的经济学说,作出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

^① 参看:《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8页。

作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依托和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反映在经济关系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共同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例如,以自由竞争为主和以垄断为主即是两大基本阶段。这种情形要求人们在考察近代西方经济学时,应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物及其学说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评估,将不同的学说同各自相应的历史阶段和时期相对照,避免由于对实践的演进缺乏理解而导致理论评估上的偏颇。

实践既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末,任何理论、学说、主义及思想都不能也不应被用来排挤甚至取代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理由很简单,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位的,思维是否正确或具有真理性,要受存在的制约和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应以之作为真理性的标准,相反,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标准,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永葆真理的光辉。

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上,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存在着证实论与证伪论之争。我们应当坚持实践基础上证实与证伪的统一,并以证实为主。任何经济学说如不能被实践证明其真理性,便算不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同样,任何经济学说如没有被证伪的任何可能性,也不会是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不会被证伪即所谓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就经济学说而言,如果没有被证实的任何可能性,或者只能被证伪,则属谬误无疑,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学说必无立足之地。实际的情况是,近代西方经济学始终处于不断被证实又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被尊为永恒的真理,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被贬为绝对的谬误。在这种被实践不断证实又不断证伪的过程中,近代西方经济学是不断接近真理,还是愈益远离真理,实践

已经并将继续作出回答。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分期：对传统观点的辨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曾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明确地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两大阶段。长期以来，这种划分成为不可移易的准则而不断被重复和强调。对于马克思未曾论及的时期，人们则把古典和庸俗的划分加以扩展和引申，将古典期以前的重商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而将马克思所说的庸俗期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进一步庸俗化或晚期庸俗期，国外一些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的著作还曾提出过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的庸俗化、由内涵的（经济的）庸俗化到外延的（非经济的）庸俗化一类说法。^①

历史和现实早就对这种划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既涉及上述划分所依据的根本前提，也涉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性质和职能的基本估计。大家知道，马克思曾断言，1830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②而且，此后不久城乡无产阶级运动的出现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③马克思还断言，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必将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④一同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只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⑤这是一个完整的论断，不仅论及古典经济学，而且论及庸俗经济学（此点易被忽略），换句话说，论及的是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一个严密的论断。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历

① 早期的例证不必举了。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可以作为此类观点的一个典型代表，即：〔苏〕弗·谢·阿法拉西耶夫著《西方经济学发展阶段》，傅殷才，肖育才，晏智杰译，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⑤ 例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58页。

史命运的论断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的论断为前提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这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时限的论断。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寄予厚望,并断言社会主义革命不久便会在这些国家同时获胜。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迄今仍然存在,还在发展,并同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有的论断(包括分期)作出修改,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如此便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加以光大。如果宣称资产阶级经济学在马克思断定其丧钟敲响之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所谓进一步庸俗化,而且认为还要庸俗化下去,那末,我们有理由指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而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以其古典和庸俗的分期突出强调了古典经济学的进步性与科学性,庸俗经济学的反动性和辩护性。这有历史的需要,也有历史的根据,尤其是在马克思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将灭亡之时。问题在于,当历史的发展超越了马克思的设想,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事实、新现象和新趋势时,要不要调整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包括近代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职能的认识。

事实一再表明,西方经济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整体上说,总是既带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规范性,又带有研究实际问题、寻求经济生活规律的实证性。这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还应看到,这样的两重性往往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地并存于同一学说或同一经济学家身上。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那里,上述两重性的比重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但只属其中之一者毕竟不多。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向被看作古典经

济学的伟大代表者和完成者,然而他们学说中同时存在着庸俗的因素,这是马克思早已指出了的。萨伊和马尔萨斯一直被斥为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谁又能否认萨伊倡导自由竞争、反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历史进步作用呢?即使是马尔萨斯的备受责备的人口论,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也必须予以谨慎和全面的分析,不能再以一概否定为满足。这些例证足资证明,对近代西方经济学必须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

本书采纳的分期及全书结构

依据近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历史进程,依据这时期流行于这些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业已显示的特点,我以为可以将近代西方经济学史划分为以下三大时期。

(一) 前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和形成时期,始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最初的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迄于18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主义;大体上同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前期和中期(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相始终。研究领域起初局限于流通领域(主要是对外贸易),后来逐渐转向生产领域(主要是农业)。研究方法,在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逐渐背离和决裂过程中,呈现出向唯物主义抽象方法逼近的倾向。取得了若干理论成果并为当时主政者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论证,但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则表现为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向自由放任主义的过渡。

(二) 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业已形成并且取得长足进展的时期,始于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亚当·斯密,迄于对古典经济学此前发展作出第一次综合的约翰·穆勒,大体上同英法等国工场手工业后期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相始终,从18世纪下

半叶到 19 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家坚决和鲜明地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但其中也有人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容忍和妥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若干内在的规律,但也不乏辩解性理论。在理论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科学与谬误并存的复杂图景。经济政策主张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由放任主义。

(三) 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修正和补缀的时期,始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迄于对此前西方经济学作出第二次综合的马歇尔,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内异端学说的斗争中,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锻造更有效的武器,因而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方面均对传统古典经济学有所继承,又有所修正。不过,自由放任主义仍是其一贯的信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震撼下,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逐渐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但在近些年来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的历史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又有某种程度的复活。

我们将以几部著作分别论述以上三个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在材料编排上,以历史顺序为主线,兼顾学说内容;在史实取舍和论述上,当首先着眼于各种学说或经济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或重要性,同时为切合我国读者需要,对人们易见的文献偏略,对难觅的文献则适当偏详。

第一章 最初的理论探讨

西欧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①和“资本的最初解释者”^②，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科学地指明了重商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这当然不是说，这最初的理论探讨只有重商主义，尽管重商主义在其中占着主要地位。事实上，在重商主义发展的同时，少数人甚至比重商主义者还要早些，已经或者也对现代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了理论探讨，其中有商人和官吏，也有后期经院学派中的某些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他们对商品价值与价格，对货币的职能及其价值决定等问题发表过一些与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观念显然有所不同的看法，他们和重商主义共同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最初理论探讨。

价值和价格并不是新课题，甚至试图从个人的欲望及需求，或从商品对人的效用来解释价值和价格的性质及多寡的观点在古代希腊思想家著作中已经出现过。但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在传统即依据宗教教义和伦理原则去确认正义价格之后，重新确立世俗的欲望和需求在价值论中的地位，毕竟是一种新现象。如果说这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那末，这时期出现的以货币数量来说明货币价值及商品价格水平的观点就大不一样了。要知道，货币的价值及其职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被经院哲学派看作是宗教与国王权力的产物。世俗向神权的挑战已是不可阻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② 同上书，第23卷，第177页。

潮流，连属于经院学派的某些人物也开始脱离传统轨道就是有力的证明。

除了重商主义以外，最初的理论探讨集中在货币论和价值论上，它们构成了货币数量论和效用与稀缺性价值论的萌芽，前者主要涉及哥白尼、萨拉曼卡学派、博丹和达文札蒂等人，后者主要涉及萨拉曼卡学派、达文札蒂和格劳秀斯等人。上述两方面问题原本是相通的，因为货币数量论无非是效用和稀缺价值论的延伸和应用，但它们在這些先驱者手中还未沟通起来。

第一节 货币数量论的萌芽

哥白尼：1526

早在16世纪初，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并明确指出了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这同当时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引起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这一历史现象密切相关。随着这一过程从西班牙波及法国，又影响到英国，将货币数量同价格水平联系起来的的思想也在这些国家扩散开来，相继出现了一些论及这类问题的著述。鲜为人知的是，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以提出日心学说而著称于世的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竟是最早发表后来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看法的学者，至少也是最初论述者之一。哥白尼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他于1526年撰写的《论铸币》（*Moneta Cudendae ratio*，19世纪才出版问世），是他作为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一世（Sigismund I，1467—1548）的货币改革问题顾问时，应国王的要求而提出的报告。他在报告开头指出，贵金属大量流入对王国和公众造成了严重灾难：纷争，极度困扰，土地荒芜和货币的毁损。最后一点尤为严重，其原因就在于“当货币过多时，

币值就要下落”。^① 哥白尼又说：

“货币贬值大概是因为它数量过多。由于大量白银兑换成货币，使白银变得比货币本身更抢手；货币也丧失了它的地位：因为以这种货币买不到它所应含的白银，所以人们会由此更偏爱白银。这可采取这样的办法加以补救：停止造币，直到它恢复到它应有的水平，而且比白银更贵。”^②

哥白尼强调应把币值稳定作为一条基本要求，不管用什么材料作货币。他认为，货币必须要有其本身内在的价值，同时还应获得用作货币的额外价值。关于货币贬值的原因，哥白尼有以下分析：

货币贬值会因多种原因促成：或是铸币本身的成色减损，当一定量铸币的含铜量超过允许限度时就会这样；或是铸币份量不足，即使铜和银含量比例适当也罢；或者两者兼有，这是最糟糕的。除此以外，币值减低还可因为铸币长期使用而造成的磨损和破碎，这是将其收回重铸的充足理由。当铸币的含银量比起从兑换货币所获得的含银量少得多时，尤其如此。正是通过这些现象，人们十分准确地看出了货币贬值。^③

由此可见，哥白尼已经看出了价格水平与流通中货币量的关系，不过，他所强调的不是一般商品的价格水平同货币量的关系，而是货币同本位金属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把对本位金属的估价作为货币贬值的尺度。我们以后会知道，这同 19 世纪初英国

① Copernicus, N., *Monetae Cudendae ratio*, French Translation in L. Wolowski (1864), 转引自 T. W.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1988, pp. 16—17.

② Le Branchu, Y., *Ecrits notables sur La monnaie*, Paris, 1934, p. 7. 转引自 T. Guggenheim: *Preclassical Monetary Theories*, New York, 1989, p. 20.

③ Le Branchu, 前引书, 第 7 页。转引自: T. Guggenheim: *Preclassical Monetary Theories*, New York, 1989, p. 21.